

V T 2 3 / 0

15715

山西文史资料

第十辑



11-37-414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

50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 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智力展（1）
- 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概况……………赵瑞 张荣汎（37）
- 阎锡山的“返部干部集训团”和“雪耻奋斗团”
……………朱崇廉（96）
- “返干团”所见……………志青（106）
- 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冀孔瑞（110）
- 忻县悦来当……………王定南（121）
- 商震入湘覆没记……………周玳（123）
- 抗战初期的川口战役和中阳战役……………田韵清（136）
- 抗战初期川军入晋出晋的经过……………雷云仙（142）
- 对“河东革命记”及“河东日报”的几点补充
……………刘茵浓（151）
- 读者来信三则……………（161）

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

智力展

一、代表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

臭名昭著的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锡山反动统治最后崩溃的时期，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对山西人民实行极端残酷的特务统治的罪魁。

梁化之是山西定襄县师家湾村人，阎锡山的姨表侄。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为山西大学最守旧的学究张贯三的得意门生。他对张贯三非常崇拜，称张为山西的“圣人”，因为张贯三竭力主张复古，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反对“维新”。张在抗日时期担任过日伪山西省政府的参议，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阎军接收太原以后，梁化之首先就去拜望这位老学究表示崇敬。

梁化之由山西大学毕业时年二十六（虚岁）。毕业后即任太原绥靖公署少校机要秘书，掌管阎锡山的私人印章和特费开支。一切机要公文，都必须经梁化之盖印，阎锡山的一切特别开支，包括阎锡山所津贴的一切“御用”团体的经费，都由梁化之负责经管。因此职位虽小，权力却相当大。加以此人骄傲自大，刚愎自用，在阎锡山之下，养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手遮天的傲慢习气。

我认识梁化之是在一九三三年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时正是阎锡山大肆收买青年学生，由阎锡山津贴的“御用”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的时候。我同几个同班毕业同学，

亦想以此为进身之阶，经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介绍，领到阎锡山津贴的三百元开办费，每月一百五十元的经常费，成立了一个“太原植社”。因此，就同梁化之发生了关系，每月到太原绥靖公署去向他领取津贴。

后来，华北形势吃紧，整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危在旦夕的关头。梁化之同“植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并且透露阎锡山准备同共产党人合作，要合并改组阎锡山津贴的各团体，同时表示他对“植社”希望很大，并表示各团体合并之后，一定要使“植社”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当时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梁化之以他自己的名义，在“植社”出版的《生生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谈谈青年的出路问题》，内容是主张取消“资私有的剥削制度”，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号召青年要起来参加这种“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方面，使我们感到在我们出版的这样一个从未引人注目的小小刊物上，能登载梁化之的一篇文章，确实“增光”不小；另一方面，还听到许多人反映说，这是一篇很“左”倾的文章，它反映了阎锡山当时的一种政治态度。其实，阎锡山当时正高唱所谓“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迷惑青年，以抵制红军东渡抗日的影晌，反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我们当时在“植社”的和其他一些青年，深受这种迷惑，为之摇旗呐喊，大肆宣传。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季，由阎锡山津贴的各团体，正式合并，组成了统一的所谓“自强救国同志会”，梁化之担任了总干事，下设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等五个委员会。我们“太原植社”，也分得了青年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委员人选指定由“植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郭庆华担任（此人解放前已去世）。在阎锡山的“御用”团体中，“植社”是一个人数最少，声望最小的单位，因此我们已感到十分满足，以为不是有梁化之的支

持，就连这样一个委员的位置也得不到。

从此以后，梁化之就成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的核心领导人。阎锡山的各个“御用”团体，也由原来的李冠洋、邱仰浚、薄右丞等为首的几个大团体和许多小团体各霸一方，互相倾轧的多中心的领导，一变而为以梁化之为中心的统一领导。不久，他又担任了“暑期健身团”和“军政训练委员会”的总负责人。这样，梁化之就由一个阎锡山幕后的私人秘书，一变而为山西政治舞台上新兴的活跃人物。

在此期间，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由北平来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合作抗日，于是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梁化之便成为代表阎锡山同共产党合作的主要人物，参与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活动。

二、披着抗战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

梁化之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兹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作一些简要的叙述。

当梁化之同共产党合作领导牺盟会、决死队抗日的时候，我就听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真正敌人，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当时，我正在第二战区政治部担任组织课副课长。课长是张亦山，湖南人，“七七”事变我同这个人一起在政治部组织课担任工作时，他知道我是梁化之的亲信，便常常在我面前发牢骚，诋毁谩骂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其他领导人，对阎锡山和梁化之把军政大权交给这些领导人很表不满。并且说：“梁化之为决死队、牺盟会的领导人，实际上一切干部配备，人事调动，都是由人家操纵，因此政治部组织课也是只有空名，实际上什么权力也没有。”他竭力主张要把决死队中的人事权拿到政治部来，不应当由各决死队自行决定。他并且要我向梁化之反映这

些意见。

我最初听了他这些话以后，只以为这个人过于妄自尊大，因而置之不理。但是，日子久了，他尽管三番五次地这样说，我便向梁化之作了反映。梁化之听了，对张亦山特别表示同情和赞赏。梁化之对我说：“亦山是有经验的，他说这些话，绝不是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决死队里确实有问题。”我问他决死队里有什么问题，他说：“有共产党的问题。”

一九三八年秋季，牺盟总会和战区政治部共同筹备召开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这是一九三七年太原失陷后，在临汾附近东涧北村成立的一个牺盟干部组织）代表大会时，梁化之竭力主张把张亦山选为“民青”的常委，这样，张亦山就成了牺盟干部中的领导人物。张亦山也就更加傲慢自大，目空一切。

一九三九年春季，梁化之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回来以后，大谈他在重庆时会见蒋介石的得意情景。特别是谈到蒋介石分析二战区的局势时所说的那番话，使他感激涕零。他说，蒋介石对他说：“二战区处在抗战和防共反共斗争的最前线，不仅肩负着抗战的重任，而且必须打好反共复兴的基础。”并且说：“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同先生无论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的予以支援。”

这时候，二战区顽固分子配合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的反共高潮，不断制造反共、反牺盟、反决死队的磨擦事件。梁化之名义上是牺盟、决死队的领导人之一，实际上干着配合顽固分子对抗日进步力量进攻，积极策划从牺盟、决死队内部进行瓦解、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活动。

当时，我以二战区政治部秘书的名义，随梁化之住在阎锡山司令部所在地——陕西宜川秋林镇（政治部和牺盟总会住在距秋林镇以北十里左右的上、下葫芦村）。当时，梁化之把阴谋收拾决死队的主要目标，放在首先依靠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

队），夺取决死四纵队领导权的计划上。因为工卫队纵队长（旅长）郭挺一，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并且是阎锡山和梁化之的亲信。工卫队和决死四纵队都驻扎在晋西北，如果把决死四纵队的领导权夺过来，就可以使驻扎在阎锡山司令部直接控制的汾西地区的决死二纵队孤立起来，置于工卫队、决死四纵队及阎锡山其他旧军队的包围之中。而驻扎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则鞭长莫及，根本无法支援决死二纵队。对于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阎锡山也早已与驻扎在晋东南的国民党中央军取得联系，必要时依靠国民党中央军来收拾他们。

为了实行这个阴谋计划，梁化之又把张亦山搬出来，以视察为名，派他到晋西北与郭挺一互相勾结，具体策划这一事件。当时，梁化之对张亦山十分重视，他还特别为张亦山吹嘘，说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负责人，非常能干，有魄力，但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张亦山从晋西北回来以后，在阎锡山司令部所在地，由牺盟总会和战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的反顽固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时候，张亦山提出了一个最迎合阎锡山和梁化之所需要的口号——“组织上纯洁，政治上进步”，于是梁化之和张亦山到处宣传这个“纯洁组织”的论调。这种论调，是针对牺盟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口号而提出的。张亦山说：“没有组织上的纯洁，就谈不到政治上的进步。”梁化之说得更露骨，他说：“不求组织上的纯洁，只讲政治上的进步，结果就没有我们自己，全变成共产党的力量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在阎锡山司令部的所在地陕而宜川秋林镇和上、下葫芦一带，一浪接一浪，一天比一天高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顽派集团在秋林召开同志会的代表大

会，牺盟总会同时也在秋林召开“民青”扩大干部会议，两军对垒，针锋相对。两个会议闭幕后，在同一天晚上，顽固集团举行了提灯游行，牺盟总会举行了火炬大游行，斗争达到了空前的顶峰。这时候，梁化之对时局的发展感到越来越苦闷。每天打针，吃安眠药，也无济于事。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在阎锡山公馆开会，十一、二点以后才出来。

一天，“民青”常委会在秋林梁化之的办公室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民青”和牺盟组织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会议由梁化之主持，出席会议的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及其他民青、牺盟的负责人吕调元、胡西安和仍在秋林尚未返回部队的决死二纵队的政治主任韩钧，还有张亦山等共十余人，我当时也在场。会议以张亦山为主要对象，严厉地批判、谴责了张亦山与二战区顽固分子里应外合，从内部瓦解、破坏牺盟决死队等进步力量的各种活动。当时，张亦山在大家揭露出来的事实面前，面红耳赤，不得不低头认罪。梁化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也闭口无言。当大家最后提出决议草案，主张对张亦山进行严厉处分的时候，梁化之恼羞成怒，毫无理由地用威胁口气对大家说：“这样的会我不能主持！”说罢便起身退出会场。随后，大家又把梁化之拉回会场上来。同时撤销张亦山民青常委及在战区政治部所担任的职务，并决定送到晋东南进行察看。

经过这次会议，使梁化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原来计划派遣张亦山，依靠工卫队，夺取决死四纵队的领导权，以便进一步孤立、包围解决决死二纵队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于是，梁化之便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另作新的打算。这种新的打算究竟是什么，虽然梁化之没有公开暴露，但是从以后他所采取的措施和实际行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把首先消灭决死二纵队作为主要目标了。

他把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一直留在秋林不让返防。韩钧几次来见他，他不是敷衍几句就是托故走开，或是推托有病，拒绝同韩钧作认真的谈话。以后，韩钧又来了两次，适遇他外出。他回来时，我特地告诉他韩两次来见他未遇时，他反冷酷无情地说：“他倒想见我，我却不想见他，以后索性给他个见不上算了。”果然，从此以后，他除了外出，一回来就让他的卫士把他的门朝外锁上，只要韩钧来，就说不在。

有一天他突然给韩钧打电话，约韩来谈话。在他正同韩谈话的时候，我也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对韩的态度突然变得特别亲热起来。谈到韩钧返防的事，他还拉着韩的手，走到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前面，指给韩钧应走的路线，并且表示十分关切地说：“现在顽固军队到处乱抓人，暗杀人，你必须走大路，千万不敢走小路，以防意外。”最后，他还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来，让韩钧给他题词，作为“临别赠言”。

第二天，韩钧就离开秋林，返回前线去了。当天早晨，我见了梁化之，问起韩钧是不是已经走了？梁化之面孔上发出一种狰狞的好笑。他得意地说：“走是走了，这一走可就一别永诀了！”又过了一天，梁化之在他的办公室接电话，我同政治部的另一个秘书王祥年在一旁坐着，听得梁化之突然变脸失色地问道：“怎么！小韩跑了？……一路都没有看见他？……真奇怪，都是些饭桶！”

梁化之放下电话筒以后，王祥年接着就问：“小韩不是见了你以后才走的吗？”可是梁化之连话也顾不得回答，一转身就跑出去了。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梁化之同从秋林到汾西（二纵队防地）一路上的阎锡山驻军勾通，要在韩钧返防途中，秘密实行扣捕和杀害。与此同时，让阎锡山驻扎在汾西附近的王靖国、陈长捷所属第十九军和六十一军向决死二纵队进攻。那天梁化之接到电话说韩钧跑了，就是根据沿途驻军的报告，说韩钧并没有按照

他们所预料的路线走，而是由小路直奔汾西，已经回到决死二纵队去了。

十二月十二日，晋西事变爆发了，梁化之从阎锡山那里出来，拿着决死二纵队政治委员张文昂和政治主任韩钧联名发来的誓师讨逆的电报。电报说，王靖国、陈长捷顽固军勾结日军，进攻决死二纵队，决死二纵队全体指战员誓师讨伐王、陈叛军，坚持抗战到底。梁化之手拿电报，面如土色。

三、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晋西事变后，梁化之的反动面目就更赤裸裸地完全暴露出来了。有一次梁化之十分懊悔地告我说，薄右丞、王靖国坏了他的大事。他和阎锡山商量好的几次计划，都是给他们破坏了。我问他几次什么计划？他说，一次是在当年春季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时，本来计划把参加这次会议的决死队的主要领导人薄一波等留在秋林，给他们个山西省建设厅长或其他重要名义，让他们离开决死队，然后另派其他可靠的人到决死队里代替他们的职务。可是，没想到薄右丞等在大会上突然提出一个取消决死队政委制的提案来，引起了这些人的怀疑，把这个计划一下子就吹了。另一次是在派张亦山到晋西北以前，他和阎锡山本来计划由他到晋东南改组决死三纵队的领导人，由新军教导师师长陈耀三到西北掌握决死四纵队的领导。但是王靖国却一再保证决死四纵队的纵队长卢宪高绝对无问题，非常可靠，一定能把决死四纵队掌握起来，因而又把把这个计划放松了一步，才暂派张亦山去进行视察。谁想四纵队的领导权已经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他当时还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工卫队。他说，工卫队的负责人郭挺一是绝对可靠的，但工卫队的各级领导人里也有共产

党员，因此已经给郭挺一打了电报，让他提高警惕，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把工卫队里所有共产党负责人收拾了，迅速与附近阎锡山的骑兵军司令赵承绶取得联系，共同消灭决死四纵队，否则就把部队从晋西北拉出来，向阎锡山司令部所控制的地区靠拢。

可是，梁化之的这些如意算盘，一个接一个地都被粉碎了。不几天以后，梁化之接到电报说，工卫队已“叛变”，郭挺一下落不明。

事变之后，梁化之还一心想当时住在上、下葫芦村和秋林镇的牺盟总会及战区政治部的负责人仍支持他反对决死二纵队的起义。但是，他的这个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所有这些负责人联名发表了一个“关于晋西事变”的小册子，一致谴责顽固军队向决死二纵队的进攻，积极支持决死二纵队誓师讨伐顽固军的正义斗争。梁化之恼羞成怒，便又向这些人施行恶毒的阴谋，进行迫害。

他首先企图对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下毒手。他把牛荫冠由下葫芦牺盟总会叫到秋林去，见了阎锡山，以解决晋东南国民党中央军同决死队的磨擦为借口，让牛荫冠到一战区去，代表二战区见胡宗南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牛荫冠起程赴西安的途中，梁化之却打电话给沿途驻军要没收牛荫冠所带的护照，阴谋进行杀害。与此同时，他又打电话把刘岱峰从上葫芦政治部叫到秋林来，说有要事相谈。可是，他预计刘岱峰已动身将到秋林以前，他却带了几个卫士走了。临走时，吩咐他下边的人们说：“刘岱峰来了，就说我有事临时外出，让岱峰一定要等我。”他走后，刘从上午九点左右来到秋林，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还不见他回来，刘便又回到上葫芦去。不想梁化之是用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诡计，把刘岱峰叫到秋林来，他却从另一条路跑到上葫芦去亲自缴了政治部警卫连的枪械撤换了连长，并且还搜查了刘岱峰的家。下午四时左右，梁回来了，一进门就问：“岱峰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人们告

说刚才走了不久。接着他便自鸣得意地说：“今天可叫他上当了！我把他的武装也解除了，看他还有什么本领。”

第二天午后，上葫芦政治部秘书王祥年突然打来电话报告梁化之说，刘岱峰同爱人带着卫士一早就走了，一直没有回来。并且说，有人在上葫芦以北二十余里的地方碰到刘峰岱和他的爱人，同牛荫冠相偕，往陕北去了。

梁化之接过电话以后，呆如木鸡地坐在椅子上，气得半天说不上话来。

有一天，我见两个佩带着阎锡山的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徽章的干部，鬼鬼祟祟地同梁化之在办公室里谈话。第二天，胡西安（牺盟会负责人之一）急急忙忙来找梁化之，适梁化之外出。胡西安便告我说，“青军团”政治主任吕调元（也是牺盟负责人之一）被捕了。我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之后，突然想到这件事一定同昨天两个“青军团”干部来与梁化之密谈有关。不一会儿，梁化之回来了，胡西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请他设法营救，但他却假作惊奇地说：“我不知道，回头打听一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胡走后，他却恶狠狠地说：“哼！无毒不丈夫。要营救，到阴曹里去营救吧！”

不多几天，又一个不祥的消息报告给梁化之，驻在宜川县城西八十余里官亭镇一带的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打来电话说，民大负责人梁膺庸也带领部分干部和学生到延安去了。梁化之放下电话，报告了阎锡山，便立即动身，亲赴官亭镇，把民大全体干部和学生带回秋林镇来。当时民大负责无人，梁化之便派我去民大负责。

四、从“自动引退”到二次出场

随着“晋西事变”的爆发，梁化之在二战区的地位一落千丈。

原来，梁化之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自以为是二战区有权有势的了不起的人物。所有阎锡山左右的人见阎锡山的时候，谁都不敢携带武器，只有梁化之一个人可以随身携带卜朗宁小手枪，随便进入阎锡山的卧室，任何人不敢阻拦。“晋西事变”之后，梁化之亲自拿着这支自用的手枪，向阎锡山缴了械，并自动引退，辞去一切职务，到成都、重庆等地居住。

在此期间，一向公开反共、反牺盟、反决死队的王靖国取而代之，成为阎锡山之下唯一的权威人物。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势力大抬头，形成二战区内部军人专权的局势。文人势力也随之而受到排挤、打击和压制。于是军人和文人的内部矛盾又日益发展起来。几个月以后，以李冠洋为首的一派文人，便积极酝酿成立“文人组织”，借以抵制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组织”——“铁军组织”。但是，由于这一派文人势力比较软弱，不足以与军人势力相抗衡，于是便向阎锡山建议电召梁化之回来，拥戴梁化之做文人组织的头目，与军人组织相对抗。阎锡山一向是“二的做法”，即培养、制造两派力量，互相牵制，以巩固其对内统治。这时候，阎锡山也唯恐造成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势力一手遮天的局面，于是也同意叫梁化之回来。这样，梁化之就二次出场了。

梁化之于一九四〇年春季到了四川，同年秋季又回到二战区。回来以后，即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亦名“最后同志”，取意是要与阎锡山同生死，共患难，做阎锡山的“最后同志”，宣誓以生命献给阎锡山，终身不脱离组织。这时候，阎锡山一面培养文人的“最后组织”，与军人的“铁军组织”相对抗；另一方面又成立了包括文人与军人在内的统一的“甚干组织”，造成了文人与军人互相牵制，互相对抗，但均统一于阎锡山一手控制之下的局面。同时，通过这三种组织，对内实行了法西斯的特务统治。梁化之便成了帮助阎锡山实行这种特

务统治的幕后主持人。

在梁化之的策划之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在阎锡山首脑部所在地——吉县克难坡，举办了所谓“洪炉训练”。这时候，阎锡山正同日军勾结，积极进行对日妥协投降的活动。阎锡山在这个“洪炉训练”中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通过这次训练，对内进行了投降妥协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准备。

当时，我仍在民大负责。梁化之把我从民大叫到克难坡也参加了这次“洪炉训练”。训练中，实行了一整套特务统治的办法，什么“循环检举”、“突击密报”、“不容人不”、“能使人能”。在受训人员中造成了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密报，人人自危的局面。稍一不慎，就有被拉去实行“自裁”的危险。阎锡山成了太上皇。只准称阎锡山为“会长”，而且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人一说“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在各种集体场合中，一见阎锡山出来，都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敬爱会长”、“服从会长”的口号。阎锡山一说话，都得立正静听，阎锡山不说稍息，谁也不能稍息。有一次开会时，发现有人自动稍息了，便被叫到“洪炉台”上跪了一个多钟头，直至散会才允许起来。整个训练中，到处充满了法西斯的窒息气氛。这种法西斯训练办法，就是在梁化之的建议和策划之下进行的。我也不只一次地听梁化之对人说，这是效法蒋介石在重庆举办的中央训练面的办法进行的，而且比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过这一次的“洪炉训练”，“文人组织”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梁化之的声望也开始扩大了。第一期“洪炉训练”结束以后，阎锡山勾结日军，准备对日投降的活动便逐渐公开化了。日军占据的孝义县城，已经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的许多部队、机关纷纷向孝义转进，有人并公开宣称不久就要西太原。

民大的干部学生，坚决反对阎锡山投降日军。我原来认为阎锡山和梁化之也是抗日的，认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抗日”的想法，也完全破灭了。因此，便同民大全体干部和学生一道，准备举行反对阎锡山投降日军的武装起义。但是，起义被梁化之和阎锡山的顽固军队镇压下去了，我同几个领导民大起义的主要干部被梁化之扣捕了。

民大起义失败之后，一九四二年的夏季，阎锡山投降日军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为了掩盖他投降日军的罪恶活动，大吹大擂地搞起了一场所谓“晋西大保卫战”，而在这个“晋西大保卫战”的锡子下，把他所控制的晋西各县，划分了五个区，成立了五个“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在每个委员会之下，附属了一个战地动员工作团，在晋西各地实行了各种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措施。

这时候；梁化之担任了所谓“隰汾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带领大小喽罗和一个战地动员工作团，在隰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

五、以特务起家

“隰汾区战工会”设在隰县城内，管辖隰县、汾西两个专区，和隰县、汾西、大宁、永和、灵石等五个县。梁化之就任“隰汾区战工会”主任时，把他原来二战区政治部组长齐宪孔、政治大队（也叫干训所）主任韩晋材，以及其他干部王静庐、尹遵党、吴反顽等一千人，并且把他派到民大去的张锡珣、兰风等也调去，成为梁化之在隰汾区开展工作的主要骨干。同时，把政治部干训所全体学员和民大的部分学生也调到隰汾区去，放在上述他那一批骨干分子的控制之下，正式成立了“隰汾区战工会”和“战工团”。

同时，梁化之把张亦山也从重庆叫回二战区来，同梁化之坐镇隰县，作了梁化之的“军师”。从此以后，梁化之就在隰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特务工作。

梁化之在隰汾区的特务工作，是首先向“战工团”内部的民大学生开刀的。当时，被调到隰汾区的民大学生，由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学习组织，叫做“青年读书会”。梁化之和张亦山深知民大学生具有过去牺盟领导下的进步传统，并且在不久之前，曾举行过反对阎锡山投降日军的武装起义。于是，认为民大学生不可靠，便千方百计企图在民大学生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一开始，梁化之和张亦山处心积虑地指使他们的忠实喽罗从民大学生中找弱点。几个月之后，他们便找到四个原来从民大二分校转到民大本校学习的学生。因为民大二分校与民大本校不同，民大二分校从开始成立就一直在顽固分子孟祥祉的控制之下，学生们所受反动的教育毒素也很深。而这四个学生从二分校转到民大本校之后，则在民大本校干部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下，也积极参加了反对阎锡山投降日军的起义，并与民大本校学生很快就团结一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时候，梁化之和张亦山便认为，要想分化民大学生，二分校这四个学生可能是最薄弱的环节。于是，他们便想尽方法从这四个学生身上下手，进行分化工作。

这四个学生原来在民大二分校时，绰号叫“四大金刚”。梁化之一见这四个学生就同他们开玩笑，故意不叫他们的名字，即叫他们的绰号。其用意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同他们无拘无束，便于接近；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把他们原来在二分校的这个绰号恢复起来，引起他们对二分校的留恋，同民大学生划开界线。同时，梁化之把这四个学生的工作也作了别有用心地安排。其中一个做了张亦山手下的秘书；一个由他出面保送到进山中学去学习，以图

深造，并且给了经济上的资助。另外两个则分配到“战工团”所属的两个战工队中工作。结果梁化之和张亦山的这个阴谋果然实现了，四个学生一齐上了钩。

在这种情形下，民大学生的秘密学习组织“青年读书会”被破坏了。当这个秘密学习组织被“四大金刚”中的一个学生向梁化之泄露以后，梁化之同张亦山便立即跑到领导这个学习组织的民大学生冯文奇所在的那个战工队中，亲自同冯文奇进行秘密谈话，并当面掏出手枪，向冯文奇威胁说：“文奇，今天要你马上回答一个问题，要死要活，由你自己选择。要活，就立即交代你和共产党的关系；要死，就是这支手枪。希望你毫不犹豫，立刻回答我。”

结果，冯文奇在梁化之的威胁之下屈服了。他把民大学生参加“青年读书会”秘密组织的名单，全部交给了梁化之和张亦山。但是否交代有共产党的关系，我不了解。最后，听说梁化之吩咐他不让泄露。第二天，梁化之和张亦山便根据冯文奇交出的名单，分别去找到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其他民大学生，一个一个地进行威胁。当这些学生一个个表示屈服之后，梁化之便让他们以服从张亦山的领导，公开参加扣捕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特务工作为条件，给予他们以生命安全和工作的保证。在梁化之的这种秘密威胁和各个击破的阴谋诡计之下，所有这些学生都弄不清楚他们的这个秘密学习组织究竟是谁向梁化之泄露的。因而互相猜忌，谁都不敢对谁说真实话。结果，个个人都作了梁化之的精神俘虏，服服贴贴地接受张亦山的摆布。

民大学生被彻底分化和被完全控制以后，“隔汾区战工团”便在梁化之和张亦山的直接指挥之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所有过去的牺盟会员，曾经在牺盟会领导之下的农救、青救、妇救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中的会员和团员，以及曾经参加过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组织的人，大批大批